

# 对话性的流变 ——从苏格拉底到巴赫金

廖慈惠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大学英语部, 广州 510665)

**摘 要:**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其流变历经五阶段:第一阶段指“苏格拉底对话”——通过对话探寻真理,这是一种辩证法对话。第二阶段是“梅尼普讽刺”,它以喜剧手法戏拟现实,“非圣无法”、“疾虚妄”,是一种文学性对话,也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对话构成对话性流变的第三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代表。第四阶段涉及新型对话关系问题的提出。布伯论述了对话的“我——你”关系问题,将对话性的研究提升至新水平。第五阶段始于 20 世纪初,巴赫金视“对话”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认为对话无处不在,并指出开放式的“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从而全新地发展了对话性。

**关键词:**对话性;辩证法对话;复调对话

自从有了人类的交往便有了对话的存在,从远古到现代的文化遗产中有研究对话的丰富资源。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学界大多数人都已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涵的阐释作为对话性的定义。<sup>[1]</sup>所谓对话性是指话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判定和补充、问和答等言语关系。<sup>[2-3]</sup>其实,自从有对话形式出现以来,对话性在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质不同,呈现阶段性特点。在分析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以前的研究者对于对话性的关注多集于某一代表人物或某一阶段,而未见有对其做历时性系统梳理的研究。我们初步研究后认为,对话性流变有一条主线,它始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外显性对话,其后是“梅尼普讽刺”喜剧式对话,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在思想对话,经由布伯的“我——你”关系对话,发展到巴赫金语言哲学对话。

## 一 “苏格拉底对话”辩证法的初期实践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最早源于古希腊的论辩传统,其最原初的意思是指一种“对话”的思想方法,即通过对话,通过相互的论辩来揭示命题或事物的矛盾,并从矛盾中得出某种相对确定的结论。公元前五世纪,雅典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认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能是个人的感觉和利害。他的思想为当时的民主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但也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端,产生了智者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智者的思想在政治上虽然起过进步作用,但却是古希腊哲学最初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哲学。苏格拉底反对

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他要为各种伦理道德范畴寻求普遍的定义。他反对用灌输知识的方法教育青年,主张用论辩法难找出对方论证中的矛盾的方法,启发人们自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于是,就有了“苏格拉底对话”。

苏格拉底把通过对话寻求真理同郑重的独白对立起来,认为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头脑里,而是在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对话中产生。“苏格拉底对话”有两种基本方法,即“对照法”和“引发法”。前者是就对话涉及的具体客观对象而言的,通过对关于该对象的不同看法与观点的对比,多方位多侧面地打量它,使对象摆脱片面性及自我封闭性;后者则是就对话主体而言的,将对方从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引逗出来,把注意力投向它面前的“苏格拉底”,从而助成对话交往,让思想在对话中交锋。柏拉图著的《对话录》包括《斐多》、《美诺》等共约 30 篇。它所记录的“苏格拉底对话”主要有两层涵义:“第一,‘对话’意味着辩证法”;“第二,辩证法意味着‘正反’”。<sup>[2]</sup>苏格拉底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将论题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最后得出真理。辩证法就是通过对话达到真理的方法,对话性表现了古希腊辩证法的精髓。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佯装自己无知,与别人唱反调,对同一论题通常形成正反面两种观点,通过对立双方的辩论,真理最终脱颖而出。就此而言,辩证法是通过辩论逼出真理的逻辑。这也体现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具有平等性。“苏格拉底对话”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伟大转折,苏格拉底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天上拉回了人间,“辩证法”则是实现这一转折

收稿日期:2009-01-22

作者简介:廖慈惠,男,湖北老河口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应用语言学。

的基本方法。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对于人类抽象思维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推进作用。但抛开人类认识发展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片面追求‘终极真理’,又使‘辩证法’最终蜕变成否定人类认识能力、为神学张目的精神堕胎术。”<sup>[3]</sup>这就是从现象、个别和特殊出发,通过一次次的诘难,逐步剥离那些个别的、特殊的、有矛盾的东西,从而达到最一般的认识。精神助产术就是“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义”的最基本手段,服务于获得绝对普遍的知识。但在人类认识的任何阶段,要获得“绝对真理”和“一般定义”都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把“知”等同于“一般定义”的获得,混淆了具体知识和一般知识的关系,成为助产术沦为堕胎术的认识论根源。苏格拉底一再强调,无人想要自己不幸或故意坑害自己,所以“无人自愿作恶”,人们之所以作恶完全是出于“无知”,认识到善是什么的人,就会自觉行善。这实际上漠视了“知”与“行”的区别。当然,在认识发展史上,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正向作用是主要的。无论如何,这种对话体开创了思想领域一种全新的体裁,为辩证法的传播提供了最佳方式。即使在后来,本义上的“苏格拉底对话”已经衰退,但它的内在精神却在许多变体中得以发扬光大。其中典型变体为“梅尼普讽刺”。

## 二 “梅尼普讽刺”:一种戏谑式的喜剧对话

“梅尼普讽刺”以“诗文杂糅”为特征,而梅尼普本人的创作并没有流传下来。梅尼普斯“不理会哲学的系统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讽刺作家:‘隐藏着的一笑就咬人的狗。受到喜剧、滑稽剧和笑剧的启发,成了以他命名的讽刺文学的创始人,法罗的《萨图拉·梅尼庇埃》,塞涅卡的《阿波科罗沁托西斯》都模仿了他,尤其是卢奇安,他的不少作品都模仿了他。”<sup>[4]</sup>

卢奇安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借对话体形式来表述的。但他不仅用对话形式来探讨哲学问题,也用它来针砭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创作了一种短小的讽刺性喜剧形式。《卢奇安对话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一切外表“神圣”而实质虚假事物的“疾虚妄”,对当时社会盛行的宗教、迷信及知识上的无稽之说的全面揭露。卢奇安生活的罗马帝国后期,希腊本土的奥林匹斯宗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源自东方的基督教也正在兴起;社会上利用宗教迷信装神弄鬼的巫师、术士等招摇过市。卢奇安对此一一加以批驳。他对正在兴起的基督教表示怀疑,对雅典时代“爱智”的哲学学派不合常理的无稽之说加以戏拟揶揄,嘲笑哲学家们的胡说八道。总之,卢奇安在对时代的一切“虚妄”做淋漓尽致致的指斥,成为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揭发者与批判者。”<sup>[5]</sup>

在巴赫金看来,“梅尼普讽刺”是一种狂欢化了的体裁。狂欢化是一种揭露性的艺术视角,“颠倒看”,正面反面一起看,使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新社会”与“新人”的生活受到质疑,一切变都得具有相对性和两重性。“这种体裁根植于狂欢体的民间文学,它对希腊文学、罗马文学、拜占廷文学有

决定性的影响”,<sup>[6]</sup>对欧洲文学发展极具导引作用。

对比“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我们发现后者对前者的传承,并且后者又将前者做了民间还原,使它重返民间。如果说“苏格拉底对话”作为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仅仅只能为一部分智者所娴熟掌握,那么“梅尼普讽刺”则已经是一种相当大众化的言谈或创作方式了,它世俗化的一面更明显,如杂体性更加明显,笑谑更具广场性,虚构色彩更浓,想象更加大胆。它既是喜剧对话,又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从斯多葛哲学开始,贯穿整个中世纪,辩证法一直与形式逻辑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在16~18世纪西方大哲学家不断涌现,新论迭出,但‘他们似乎都把辩证法遗忘了’。”<sup>[2]</sup>近代哲学家中首先重新发现辩证法的是康德,其后黑格尔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是内在的思想式对话。

## 三 康德、黑格尔式辩证法:内在的思想式对话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对话性由外显转向内隐,呈现出内在思想性的特点。“对话”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二律背反”中得到运用。所谓“二律背反”即“理性矛盾”,指两个相互排斥但同样是可以论证的判断之间的矛盾。这些判断“有些仅仅是表面自相矛盾的,有些是真正自相矛盾的”,<sup>[7]</sup>都具有相等的逻辑论证力量。或者说,这种诡辩的命题既不能希望得到证实,也不怕来自经验的反驳。正题没有矛盾,而且根植于理性的必然性中,但是偏巧反题同样能够为自己的成立举出切实有力和必然的根据。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构成宇宙论的观念,都使自己陷入各种对立中。康德举出四种这样的“二律背反”,各是由正题和反题组成的。第一种正题是:“世界有时间上之起始,就空间而言也有界限。反题是:‘世界并无起始,亦无空间上之界限,就时空两者而言,世界乃是无限的。’第二种证明每一个复合实体既是由单纯部分做成的,又不是由单纯部分做成的。第三种的正题主张因果关系有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和依照自由律的因果关系两类;反题主张只有依照自然律的因果关系。第四种证明,既有又没有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sup>[8]327-346</sup>康德如此解释“二律背反”学说:“如以正面主张为一切独断论之名,则反面主张并非指相反之独断的主张而言,乃指两种外观上独断的知识(正面主张与反面主张)之理论冲突,其中并无一种主张能证明其胜于另一种主张者。”<sup>[8]327</sup>康德的辩证法对话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对话有相似之处,如对论题循环论证的理论风格,对重要思想的定义都是最后出场的论析特质。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康德的对话过程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是在里面的,不像柏拉图那样把对话完全外化出来,具有戏剧性的生动。即是说,康德的辩证法哲学深入到反思过程内部,不是对话形式,而是内在的对话。

康德这种内在对话形式,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近代欧洲辩证思维的发展。该著作的这一部分对黑格尔有极大影响。后来,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等前辈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吸取了他们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建

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精神现象学》一书是他铸就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辩证法基础的标志。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话思想主要反映于他对矛盾的重视和他提出的辩证法三大法则。他认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sup>[9]</sup>他的辩证法三大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黑格尔的论述发展了辩证法哲学,深化了内在对话性。

然而,康德的辩证法与古希腊的辩证法虽然意味着思想的逻辑,但古希腊辩证法作为逻辑是肯定的和积极的,揭示的是事情的真理,而康德辩证法作为逻辑则是否定的和消极的,在认识中揭示的是理性的矛盾。黑格尔不认同康德辩证法,而最终回到了古希腊辩证法的肯定性和积极性。从苏格拉底、“梅尼普讽刺”,到康德、黑格尔,辩证法的对话性以外在形式和内在思想两层面展现。

然而,一直以来哲人们对于对话的核心问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的“主体间性”、“关系本体论”、“外位性”等哲学思潮,都是在讨论自我与他人的新型关系:主—主关系。布伯阐述的“我—你”对话关系,揭示的正是这种新型关系。

#### 四 布伯的“我—你”关系:新型的“主—主”对话关系

布伯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与你》是他最重要的著述。布伯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分为“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在“我—它”关系中,人把他周围的他者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与我相对立的客体,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知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我—它”关系是一种相互对立和平等的关系,非直接的亲密关系。传统西方哲学的主体论就属于这种关系。

“我—你”关系不是一种功利的工具关系,“你”不再是一个与我相分离的对象,而是具有与自己同样的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他人他物,“你”就是世界,“你”是具有神性的。“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真摹本。”<sup>[10]128</sup>在“我—你”关系中,我向你诉说,你则对我做出回应;每一方都以整个身心投入这种关系。这是一种直接性的关系,即直接的体认。布伯将“我—你”关系称为对话关系。从表面层次来理解,说“我—你”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是因为它是基于语言的诉说与回应的关系。然而,布伯又说:“语言是‘你’的家”,“人栖居于语言,非语言寓于人。”<sup>[10]57</sup>这就在实质上表明了基于语言的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就是对话。实际上,“我—你”关系作为对话关系,除了它的关系本体论特性,它的语言性还体现了对话性的另外一些重要原则,即平等性和互动性。该书对“我—你”关系的论述,增添了对话关系的新内涵,推进了对话性的研究。

始于20世纪早期,几乎与布伯同时,巴赫金卓越地建树了崭新的对话思想。巴赫金首次把“对话”作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全面运用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考察,从而

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话性。对话性在巴赫金的语言哲学中成为核心概念。

#### 五 对话性: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

罗贻荣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概括为“行为—伦理学”、“哲学—美学”、“超语言学”和“小说诗学”四个部分。<sup>[11]</sup>“行为—伦理学”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提出“应分”这一概念,论证了个人行为与整体存在的关系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在“哲学—美学”中,巴赫金提出“超视”和“外位性”两个概念,从认识论的主体建构角度,论证了一个人与他人对话的必要性。“超语言学”通过研究“言谈”的“双声性”等特征,论证语言的对话本质。超语言学让语言成为连接巴赫金语言学与哲学—美学、行为—伦理学的纽带,使对话理论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巴赫金理论的体系正是由对话性这一统一的主题贯穿着,而其对话理论体现出这样的特性和原则:平等性、现场性、互动性、互惠性、非预设性和未完成性。

1. 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在以沃洛希诺夫署名的论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便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语言哲学观,强调了语言中的三个因素——人的创造、社会的功用和价值的属性,同时也把“对话”与“独白”对立,以前者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以后者批评当时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sup>[12]</sup>巴赫金批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抽象客观主义”,强调了语言的“对话性”与“社会性”,巴赫金认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实际上研究的都是脱离语境的孤立的“独白”,这样的研究只要求读者去被动地解读话语而不是与之形成主动的对话关系。故他主张将语言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对语言进行动态研究,并提出了以对话性为核心的话语理论。他认为,话语是语言交际的最基本的单位,语言真正的生命便在于话语。而任何话语都具有“内在对话性”。<sup>[13]</sup>一方面,任何话语总是处在社会的、历史的言语文脉之中。不管我们的一段对话看起来多么具有独白性,实际上它都是对他人的回应,是先前话语的继续和反响;另一方面,任何话语都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巴赫金十分突出地强调了人类言语活动的双向交流的特性。话语的这种对话性,体现了人类思维和意识的对话本质,体现了生活的对话本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符号的物质实体通过社会冲突和对话的过程被转化为意义。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说生存充满了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形态。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

2. “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巴赫金采用超语言学的方法,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再是作者统摄下的整一世界,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之中,相互不发生融合。由此,一个全新的叙述视角代替了独白式的叙述视角,进而实现了“本文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sup>[14]</sup>陀氏小说中这种对话的多层次性,既有主体之间的外在对话,更有主体内部的内在对话,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对话”。巴赫金认为,

“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文学作品不再仅仅看作是作家声音的转达者和被动的研究对象,作品中的主人公甚至能与作者直接对话,而作品的意义也就产生于对话之中。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并揭示出复调小说同古代希腊、罗马庄谐体文学和民间狂欢节文学的内在联系。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型的复调小说正是属于狂欢体这条线索,是狂欢体的变体。而对这种变体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体裁,其中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的讽刺”。这种体裁小说反映了深刻的狂欢式世界感受,体现为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变更的精神以及死亡和新生的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受欧洲狂欢化文学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形成了自己新的狂欢化风格,形成了狂欢文学在19世纪的新形式——复调小说,使得传统的狂欢化文学在他的创作中复活。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理论是20世纪文学理论最主要的发现之一。复调性标志着某种统一的一元性的真理被打碎了,没有什么人掌握着唯一正确的真理。任何一个人物都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而已,没有谁能代表权威立场,更不代表某种真理性。只有开放的对话式的话语,才有可能在对话中接受应对,得以检验和发展,才有可能逐渐接近终极的可信的结论,所以才能够担当真理的声音。把“对话”从一个语言学概念转换成“哲学范畴”,巴赫金成就了独特的语言哲学,从而全新地发展了对话性。

综上所述,本文勾画出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流变的脉络。对话性的流变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即“苏格拉底对话”,第二阶段是“梅尼普讽刺”。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式对话构成对话性流变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布伯论述了对话的“我—你”关系问题,给予对话性以新的阐释。第五阶段始于20世纪初,巴赫金把“对话”作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全面运用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强调对话的无处不在,并且指出开放式的“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的本质也是对话。无论是社会学界、文艺理论界、美学界、语言哲学界,还是当今世界政治,只有承认多元性、多样性,以

互动、开放的态度平等对话,才能和谐共荣。

#### 参考文献:

- [1] 萧净宇. 超越语言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98.
- [2] 姚大志. 什么是辩证法?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 (6): 14 - 17.
- [3] 黄可波. 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由精神助产术到精神堕胎术 [J]. 江汉论坛, 2000 (7): 67 - 69, 51.
- [4] 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1: 184.
- [5] 黎杨全. 周作人与希腊文学、希腊文化 [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5: 21.
- [6] 程正民.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84.
- [7]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M]. 庞景仁,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155.
- [8]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M]. 蓝公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 [9] 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58.
- [10] 马丁·布伯. 我与你 [M]. 陈维纲, 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6.
- [11] 罗贻荣. 走向对话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5 - 6.
- [12] 巴赫金.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M] //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 张杰, 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401 - 402.
- [13] 巴赫金. 言语体裁问题 [M] // 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 晓河, 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81 - 182.
- [14] 朱立元. 现代西方美学史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1116.

(责任编辑:卫 华)